

給我們國度的信物

●李敏勇／詩人

1993年到1994年，我出任台灣筆會會長。成立於1987年2月15日的台灣筆會，異於中華民國筆會，有在野的、異議團體的性格。當時，仍處於戒嚴時期，解嚴是過了幾個月的事。後美麗島事件的1980年代，追求民主化、自由化成為某種社會風景。台灣筆會的宣言為一群台灣作家對時代留下見證。

作家應當是一個精神的政府。

作家應當是社會的良心、時代的證人；也應當是心靈的守護神，希望的領航員。

作家應當站在人的立場；堅持公理與正氣、信守和平與愛、追求善美和真實；透過文學和藝術的創作、評論和研究、透過社會批評、更透過文化運動，彰顯其意義和價值。

因此，作家應超越一切黨派和政治權利，自成健全強度的體系。

但是，四十年來實施戒嚴體制的台灣，作家沒有扮演正當角色的充分自由，也沒有發揮應有功能的理想環境。在長期政治和商業公害侵襲下，雖然有些作家在困厄中堅持在野立場，努力實踐作家職志，卻也有些作家淪為政治附庸和商業幫閒，有些文藝團體在濃厚官方色彩籠罩下，限制了文學藝術的健全發展。

反省過去，由於多數作家既未能建構一個精神的政府，監督政治權利，也尚未能創造出世界性作品，得到社會的肯定和尊敬。以致喪失了應有的藝術和倫理位置。

在改善和沉淪的轉捩點，我們看到許多關心台灣前途的理論和實踐、批評和建設，一波一波前仆後繼展開，已獲得社會的重視支持，產生了成效。台灣的作家應當在認識上做全面的覺醒，在實踐上做徹底的投入，善盡社會責任。

我們深信：政治民主化、經濟合理化、文化優質化是台灣社會的理想和憧憬。唯有全面的社會改革，才能重建我們的社會。而文化運動是一切改革的根源，唯有全面性的社會改革，才能改善社會體質。

我們信守作家的藝術良心，將從各種創作、評論、研究，從文化運動，積極扮演作家角色，發揮作家功能。

我們呼籲：所有作家做時代證人、社會良心；落實本土、開放胸襟；以世界性視野，開拓台灣文學藝術的新領域。

我們要求下列文化改革：

- 一、確保作家創作自由：反對以任何方式壓制言論自由。
- 二、維護作家尊嚴：反對黨、政、軍對文藝團體的籠絡和箝制。
- 三、促進出版、影視、戲劇的發展：反對任何不當檢查、查禁、查扣。
- 四、開放一切文學藝術資訊：反對一切阻礙思想交流的措施。
- 五、解除對所有大眾傳播媒體的限制：反對報紙、電視、電台及其他資訊的壟斷。
- 六、尊重台灣本土歷史、文化：反對任何扭曲、竄改。
- 七、尊重台灣地區各種母語：實施雙語教育，反對一切妨礙母語傳播的設施。
- 八、增加特級學校台灣歷史、文化課程，並設立台灣文學藝術研究機構，反對忽視台灣本土的教育政策。

台灣筆會的成立，是台灣作家強烈認同這塊土地，關心台灣全體住民的再開始。願台灣作家共同努力，創造台灣新文化，建設理想社會。

我是繼楊青矗、鍾肇政、陳千武諸式，繼任會長的。在我之後，李魁賢、鄭清文、李喬，繼而鄭炯明、曾貴海、彭瑞金…延續了行列。我出任台灣筆會會長之前，連續為三任前期會長擔任秘書長的工作，為會務協力。出任會長的即時，計劃了和兩年任期相符的台灣筆會聯誼月餐會（Taiwan Pen Dinner Club），每月第三個週末晚上，在台大校友會館二樓西餐廳，邀請來賓主題演講。參與者是以名譽會員和一般會員的台灣筆會會員和社會友人。持續不輟的兩年二十四個月餐聯誼會，留下台灣的二十四堂課。

當時的演講，熱心的莊紫蓉不只參加了全程，更記錄了全程，也披露在台灣時報副刊提供的台灣筆會月報專欄。台灣的二十四堂課就是每一場的演講文本，呈顯的是主題的精華。涵蓋不同領域，幾乎是當時我熟識的，在台灣的國家重建、社會改造課題的卓越之士的言說。

台灣仍未真正完成國家的正常化。1996年，總統直選，歷經多次政黨輪替執政，未正常化的國仍然要有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省視與真實觀照。台灣筆會成立宣言的政治民主化、經濟合理化（福祉化）、文化優質化，仍然提示社會責任的省思要求。在1993年到1994年留下來的演講，以台灣筆會留給我們國度的信物—台灣的二十四堂課—或是某種瓶中信般的禮物，是我，也是台灣筆會的一點心意。

謝謝二十四位主講人，其中有些已離開人間，與我們告別。因為這些講辭，二十四

位主講人是常在的。謝謝你們在台灣筆會的聯誼月餐會，留下各自在你們領域對台灣朝向正常、健全、進步國家的精闢之見。謝謝莊紫蓉，在經過二十多年，妳記錄的這些卓越之見，才編集成書出版。謝謝台灣筆會聯誼月餐會的參與者，你們讓台灣筆會以有意義的形式連結了我們的國度。◆